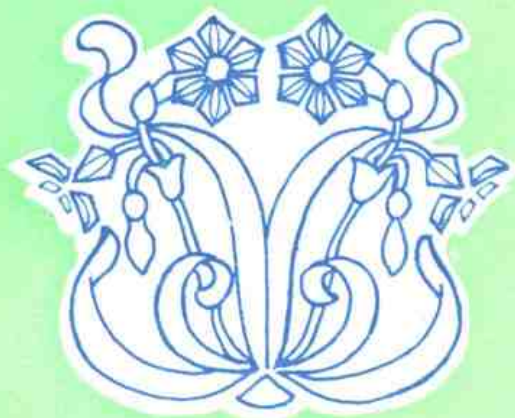


宁夏文史资料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辑

第十期



2707933

族研究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辛亥革命打落了亚洲的第一个皇冠	杨 策 (1)
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马寿千 (26)
甘肃辛亥革命概略	马启成 (49)
宁夏哥老会与辛亥革命	和 龚 (86)
回忆辛亥革命宁夏民军起义	黄光篋 陈金铭 (109)
辛亥革命平罗县民军起义目击记	冒良辰 陈增寿 (121)
辛亥革命平罗民军反清斗争纪略	
平罗县政协文史组、民革平罗县支部 组织座谈	韩相德 贾崇道整理 (129)
辛亥革命宁夏灵州民军起义	李雨村 (138)
辛亥革命中卫县会党起义述略	何其正 (153)
辛亥革命灵州民军领导人之一高士秀史略	郭连城 苏复涛 (160)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清真商团	张瑛亭 (176)

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	刘廷栋 (181)
平罗县下营子教案始末	刘廷栋 (200)
关于《西北晨钟》刊载《宁夏辛亥革命史略》 一文及其作者吕锡有的两点质疑	
.....	杨发第 (219)
来函更正与补充	(229)

辛亥革命打落了亚洲的第一个皇冠

杨 策

七十年前，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打倒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但是，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常被过低估计，因而不能充分认识它的历史地位。本文仅就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评价，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中国人民所受封建帝制的沉重负担

辛亥革命最突出的历史功绩，就是它在亚洲打落了第一个皇冠。过去，人们往往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而把辛亥革命废除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政体，看作仅仅是政体形式

的变化，认为是无关宏旨的。赶走皇帝，创立民国，固然只是政体的改变，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乃至对于亚洲民族民主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影响，更不是无足轻重的。

把皇帝赶跑，推翻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突破，委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中国的时间之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深蒂固，叶繁枝蔓。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站在整个封建统治结构的顶峰尖端，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以君权为轴心。“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君权是不容分割的，不允许同时存在两个轴心。君权具有绝对性，“君权神授”，皇帝的绝对权威“有命自天”，“受命于天”。皇帝即“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因而他的权威又具有神圣性。天长地久，天地永恒，作为上天代表的皇帝自然也就与天共存，“万寿无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封建统治秩序与上天都是

永恒不变的，君权与上天同样具有永恒性。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总括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道德原则，成为禁锢人们的精神桎梏。封建统治者严格要求人们“各安其位”，绝对不准越雷池一步。谁“敢把皇帝拉下马”，不仅必道“一身剐”，而且“满门抄斩”，“诛夷九族”。千百年来，王朝嬗替，皇家易姓；但万变不离其宗，君主专制政体因袭仍旧。政朝换代，乾元更迭，都不过是走马灯环绕着君权的转动罢了。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不堪封建压迫和剥削，起而反抗，进而造反。他们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的口号，大胆地表示了农民也可以成为王侯将相的思想，但并没有否定造成王侯将相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们还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起义军）的口号，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要“取而代之”。实际上，是以新王朝代替旧王朝，并没有否定君权的绝对权威地位。黄巢号称“冲天大将军”，但毕竟冲不破皇权主义的天罗地网，打下长安，仍然是建元称帝。埋葬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军，愤怒地烧毁了皇室的祖坟，但这绝不

是铲除封建帝制老根的举动，张献忠终于在成都建国称帝，李自成在撤出北京前夕的情势万般危急之际，在武英殿“即皇帝位”。水泊梁山的草莽英雄李逵从来蔑视赵官家，一上梁山就说：“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①虽是小说宋言，却准确地塑造了起义农民“造反”“夺位”“做皇帝”的艺术形象。历代起义农民都不可能跳出取而代之、改朝换代的老圈子，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君权的绝对性、神圣性、永恒性，都不可能卸脱封建帝制的沉重负担。

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至高无上的皇帝被斥责为“阎罗妖”，地主、官吏都是“妖邪奸宄”，必须“擒尽”、“收残”。“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公然向皇帝独占的天子称号和祭天特权挑战，冲击了封建制度的等级精神。但是，太平天国即使“新桃换旧符”，却仍然摆脱不了君主政体的藩篱。“天王”洪秀全照例称“万岁”，是“皇上帝”在

人间的代表，实际上是不叫皇帝的皇帝。洪秀全把自己的权力说成是“受天父”“真命”，同样是“受命于天”。天王为“真主”，“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②。太平天国强调“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③，规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洪秀全在《福音敬录》中明确提出“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④，完全照搬整套的封建伦理纲常。奋身造反的农民虽具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但最后不过是拉下了旧皇帝，树立了新皇帝，新王朝代替了旧王朝。太平天国不可避免地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历史悲剧。

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要求改革现状，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一方面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⑤，甚至指出三纲五常“惨祸烈毒”，而“二千年君臣一伦，

尤为黑暗否塞”^⑥；一方面歌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维新派要求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表明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立场，也反映了他们参与政权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阶级要求。由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是个进步，是个突破。而君主立宪的变法维新，在当时又有很大的吸引力。远有俄国的彼得大帝，近有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变法维新的成功典型。康有为特意将《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明治变政考》进呈光绪皇帝，要他以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为榜样。维新派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他们提倡民权，但“宜先兴绅权”^⑦，强调民权与民主不同，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幻想依仗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把忠君和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看作是一回事，既不想推翻君主制度的清王朝，又不敢触动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维新派毕竟与起义农民不同，他

们或多或少地冲破了封建传统的桎梏，扩大了向西方学习的门户，让欧风美雨飘洒到千年封建帝国的中国大地上来，使中国人民在混浊窒息之中闻到了更多的清新空气。维新派要求变革政体，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希图分享政权，打破延续两千多年皇权独占的局面。但是，中国人民身受封建帝制的负担竟是如此沉重，以致维新派立志挺身而立的时候，还要死抱住皇帝作为自己的依靠，他们的变法维新也就迅速地烟消云散了。

二、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突破

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不但敢于把皇帝拉下马，而且要使帝制永绝于中国。一八九四年孙中山组成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宗旨^⑧。在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

国。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在东京青山建立革命军事学校时，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⑨的十六字民主革命纲领。

孙中山揭露康、梁“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诡伪，指出“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实际上是“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⑩革命派必须与康、梁之保皇“划清界线，不使混淆”。认为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他说：“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用君主立宪的变法维新是不解决问题的，“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他明确提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政变为‘中华民国’。”^⑪孙中山还驳斥“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

： 8 ：

次序井然，断难躐等”的谬论，指出：“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值）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⑫要不要打落皇冠，赶跑皇帝，成为革命派与保皇派争论的焦点。

一九〇五年，组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接受了孙中山的提议，以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的纲领。在《同盟会宣言》中强调提出：这次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一次“国民革命”，同时响亮地宣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他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三民主义。他在谈论民权主义问题时，着重说明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

受的”。不是因为皇帝是满族才要去推翻清王朝，“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而且要永远废除君主专制制度。他特别强调：

“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把国家当做私人的财产”，“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他认为这是他要说的“最要紧的话”^⑬。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以及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在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使民主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打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一举推倒皇帝宝座，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是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具有标志一个时代里程碑的伟大意义。

首先，这是民主共和对封建专制的突破。民主思想从此在人民中扎根，在中国再要搞帝制不得人心。搞不长久，搞不成功。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张勋的复辟旧王朝，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清逊帝炮制“满洲国”，蒋介石的借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都不过是搬起石头打自己

的脚，无不被澎湃激荡的民主潮流所吞没。至高至大的皇帝形象，变成了人们嘲笑的历史小丑。君主权威绝对、神圣、永恒的迷信破产了，人民只相信自己的权威。然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历史太长久了，君主专制的因袭负担太沉重了，想当皇帝的人总还是有的，甚至也难免有孙中山所大声告诫人们警惕“存有一些皇帝思想”的“革命的人”，演出如马克思所说“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的历史笑剧^①。但是，人民既然敢于把皇帝宝座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么，不仅是包括皇帝在内的历史亡灵的形象、服装和语言，而且一切封建主义的旧痕陈迹也必将遭到觉醒了的人们的芟夷涤荡。难道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不是这样的吗？

其次，这是人民力量对中外反动派联合阵线的突破。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矛盾，但它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派，搅乱了它们联合统治中国的阵线，打破了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秩序。从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再也无力重建“统一”的、“稳定”的反动统治秩序。英、法、俄、德、日、

美六个帝国主义强国，曾成立了“银行团”，作为掠夺、控制、瓜分中国的共同工具。辛亥革命后，六国一致拒绝承认中华民国，银行团停止借款给中国，企图扼杀年青的共和国。但是，它们的阴谋未曾得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出现了分裂。美国宣布退出银行团，并表示将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日本也随之而改变政策。列宁论述这一事变时指出：

“这个得到全世界劳动群众同情的年轻共和国的巨大胜利，就是这个黑帮银行团的瓦解。”^⑮于是，辛亥革命以前那种“大清一统”的局面被打碎了，中国统治阶级分裂为许多封建割据的军阀集团，中国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定的军阀混战之中。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的南北对峙，北洋军阀内部皖系、直系、奉系之间联盟和战争的交替，各地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着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使得反动派在辛亥革命以后再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总头目。即以把持“中央”名义的北洋政府面言，从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国到一九二八年覆灭为止，十六年间就更更换了四十届内阁，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六天。北洋军阀为了争夺全国统治权，有的叫嚣

“武力统一”，有的标榜“和平统一”，妄图实现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⑯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中国二十二年，没有一天不在高喊要“军政统一”，但他一天也没有实现过全国范围内的法西斯的统一。且不必说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一天也没有停歇过，就是国民党新军阀内部也没有保持真正的统一。各派军阀“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⑰即以十年内战时期来说，一方面红色政权同白色政权生死搏斗的十年；另一方面也是白色政权内部各派军阀相互混战的十年。反动阵营内部不能再维持统一和稳定。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这种现象乃是辛亥革命以后方始出现，这恰恰显示了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这是民主主义对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近代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即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反映到观念形态上来，形成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的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斗

争。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窒息思想，蒙塞视听，妄图把人民禁锢在腐朽的封建旧文化、旧传统的网罗里。他们虚骄妄大，抱残守缺，视一切新文化、新思想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始则闭关锁国，继则围攻剿灭，他们决不允许中国大地沐浴欧风美雨。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尽管维新派的政治改革活动失政了，但文化思想的闸门终于打开了，民主主义思想迅速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各种新的社会政治学说更广泛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在一些著作中，也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中国人开始知道马克思。辛亥革命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民主主义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更大突破。列宁指出：“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他又说：“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⑩因此，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一时显得十分险恶，但文化专制主义